

# 國民史 縱橫談

吳相湘撰述

時報系書250



111  
N7  
233

吳相湘撰述

# 民國史縱橫談

大丈夫當讀萬卷

書行萬里路

孫文



## 前言

這是近年撰寫民國史事文稿的一冊彙輯，內容起自 國父惠州起義以至最近大事，涉及的人物普遍於歐亞美各國。不論時間空間都相當長久廣闊。楊乃藩兄特爲命名「民國史縱橫談」，欣然從之。如果「談言微中」，能引起國人對民國史的興趣，馨香禱祝之矣。

吳相湘



# 談橫縱史國民

## 錄目

|     |                 |
|-----|-----------------|
| 三   | 前言              |
| 七   | 國父傳記新資料         |
| 四三  | 國父・許芹・容閔        |
| 四九  | 蔣公「自反錄」的珍貴史料    |
| 六七  | 民國史的研究要擴大眼界     |
| 九七  | 從史實探討五四運動的意義及影響 |
| 一二九 | 近五十年我外交挫敗因素初探   |
| 一四三 | 成志學會促進中國現代化     |
| 一六一 | 梁和鈞晏陽初兩博士的治學精神  |
| 一七五 | 糖業大王的千金小姐       |
| 二一七 | 張公權先生清廉典範       |
| 二二七 | 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      |

|     |                |
|-----|----------------|
| 二五三 | 孟祿博士與張作霖間錫山的談話 |
| 二八一 | 趙炎午先生的手翰       |
| 二九三 | 美國檔案館圖書館觀感     |
| 三〇七 | 洛克斐勒家族與中國      |
| 三二一 | 杜勒斯是我們患難知己     |
| 三三九 | 大陸刊行的兩種「侵華史」   |
| 三四七 | 蘇俄對中國的研究       |
| 三六一 | 對日抗戰紀念碑文舉隅     |
| 三七一 | 前線敵後           |

## 國父傳記新史料

國父冥誕或忌辰，筆者總盡可能地用本文同樣的標題，報告最近所見有關國父生平的新史料，以示時時不忘此生最高志願：撰述一比較完整可傳信於世的國父傳記（前已刊第一冊，今因新史料必須重寫）。現年屆古稀，體氣尤其目力漸衰，此志不懈。祇望天主假我歲月得能完成，則不虛此生。

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臺北報紙刊載中央社東京專電：日本發現國父致犬養毅手翰一件。惜報載電訊頗有刪節。筆者因急函舊友日本元老漢學家木下彪教授

，請求設法將原書翰影印，以便研讀。不半月，木下先生即快函寄來，並謂此書翰現收藏於岡山縣博物館（「屬木堂（犬養別號）關係資料蒐集委員會」），未有公開之計；經特別情商館長同意影印寄贈。隆情高誼，令人感激。

謹按 國父致犬養毅手翰，前此未見於國內任何有關書刊，是用毛筆書寫於日本通信的卷紙，影印機複印面積有限，難以完全無瑕，今幸祇有一處稍欠銜接，全函字跡清晰（手翰影本見第三十一頁），謹先抄錄於左；再就筆者行篋少數書刊稍加注釋（原信無句讀，今試加標點）：

### 廣東惠潮嘉三府地利人和

木堂先生足下：十月六日，鄭軍起惠州，前經電達，想得尊覽。自起事以來，連獲勝利，所向無敵，勢如破竹，今已據有惠州，為進取之地（湘按此二句，報紙刪去）。此外陳君起海豐、陸豐，而進取潮、嘉二州（湘按此句，報紙刪去，實極重要語），吳君起香山、順德二縣而進迫廣東省城，以牽制清兵

。史君起西江，以窺梧州、肇慶。鄧君（湘按報載誤作趙君，大誤）起陽江陽春，而據高雷等府。清兵處處敗北，吾徒（湘按報載誤作從字）人心大振。惟草創之初，百事未備，徒手奮起，銃砲彈藥皆從清兵奪來而用，初未嘗如他人之有資財數十萬而運用之也。所恃（湘按報載誤作帶字）者人心勇敢而已，敵兵敗後，舉國興師（湘按報載漏此二字），南省大兵，已陸續雲集（湘按報載誤作迎擊）。清朝雖頹，猶儼然一大帝國；北地雖糜爛（湘按指義和團擾亂），而南部尚金湯無缺。廣州城內之銃砲彈藥猶有取不盡而用不竭之多。吾徒人心雖勇，而兵器彈藥尚乏接濟之源；久恃非計，不得不先作未雨之籌謀（湘按自「無缺」至「籌謀」，報載刪去），敢乞先生一爲盡力游說政府，爲吾人借一臂之助：若今得洋銃（湘按報載改作槍字）萬桿、野炮十門，則取廣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廣州既得，則長江以南爲吾人囊中物也。時不再來，機不可失；支那興亡，在此一舉。貴政府如允濟弱扶危，則各物可從臺灣密送。文當盡畫（湘按報載誤作化字）一切施行之策，可保無虞（湘按報載誤作險字）。如何之處？務乞早示佳音，專此謹托。即候道安不備。（湘按報載刪去上兩句）

弟孫文拜啓 十月廿一書

謹按此一書翰末署月日而無年份，幸書翰開始即有「十月六日，鄭軍起惠州」云云，可推斷爲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鄭士良在惠州起義時所書。（報載中央社此一電訊竟謂：這是一九一一年 國父書翰。新聞記者如此缺乏歷史知識，又不利用資料室，令人驚嘆。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已在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十一日， 國父當時在美國已見報紙刊載詳情，又何必寄信日本犬養毅請援？說甚麼「取廣州省城」「長江以南」一些話。一讀此函內容即知。乃竟於專電開始即定此信是「於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作書地點是在臺北。民國五十四年 國父百歲冥誕時，筆者即首先引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糾正諸家不實撰述，確切指陳： 國父於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自日本神戶乘「臺南丸」到達基隆轉抵臺北準備接應惠州起義（「近代史事論叢」第三冊第一〇三——四頁。傳記文學社刊行）。

惠州學義計劃是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 國父與宮崎寅藏等在香港海面日輪「佐渡丸」上最後裁定：奪取惠州後直逼廣州占有全粵。故書翰中有「今已據有惠

州，爲進取之地。」惟鄭軍在惠州起義日期，此書作「十月六日」且下接「前經電達，想得尊覽」二語，更可見其確實。是則「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第一二八頁引據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作「十月八日深夜」，與國父此一手翰所書時日相差兩日，顯係事後得自傳聞，故失實。且一九〇三年刊行之「大革命家孫逸仙」第四章述及惠州事件，早有「電自臺灣來，曰：六日義軍起於惠州。」鄒魯「中國國民黨黨史稿」第六六六頁亦作「十月六日」。陳春生撰「庚子惠州起義記」（建國月刊第五卷第三期）文末引錄清兩廣總督德壽奏摺亦云；「維時匪黨（指革命軍）未齊，猝聞兵到，遂定於（閏八月）十三日豎旗起事。」今按閏八月十三日即西曆十月六日，均與國父此函完全符合。「國父年譜增訂本」何以仍有此誤？

國父此一手翰中既謂「今已據有惠州」（按陳春生「庚子惠州起義記」云：惠州府十州縣地方，已有六縣爲革命黨占據，且迫近惠州府城二十里處。國父此函謂「已據惠州」，並未云「惠州府城」，與事實相符），又有「此外陳君起海豐、陸豐，而進取潮、嘉二州」二語，更可見國父對於起義地點自始即認定「以廣東爲最善」，尤以廣東惠、潮、嘉三府爲利便——一八九七年八月中下旬間，國父與宮崎

寅藏初次晤談時的「筆話殘稿」中於此即再三對宮崎言及：

「閣下（指宮崎）何不一遊廣東惠、潮、嘉三府之地？往年英法（聯軍）入北京，亦在此地招額外之兵。」

「上說之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復明之會。其人亦最強悍，官府不敢追究之。弟意此地亦可作起點之區。因與臺灣密邇，便於接濟軍火。閣下此到中國，務宜留心此地。」

「蓋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而矣。在海州（湘按宮崎主張以海州爲起點），則進取接濟，亦利於廣東矣。惟聚人則弟於此毫無把握。蓋萬端仍以聚人爲第一着。故別處雖有形勢，雖便接濟，而心仍不能捨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

### 記取初次起義失敗教訓

國父既再三強調廣東潮、惠、嘉三府地利人和，宮崎對自臺灣接濟軍火之議也

極贊成，因云：「有敝友立說曰：以臺灣南角之火燒島爲軍火頓積之處，用小船暗送運閩越之海口，可以開接濟之道，此說以爲如何？」國父答：「此說頗有理，

惟以小船送運，恐有絕奪之虞。」宮崎仍主用小船，國父乃根據經驗向宮崎說明：「必用大船，作一起齊到方可。若小船必分百數次，則先到者已擒，而在後者亦不能相助，而不能知也。小船運軍火之法，廣東前年之事（湘按指廣州第一次起義），則用之也，甚有成效。運過數十次，關卡毫無知覺。後用大汽船所運者，反被搜出。雖然小船前則有效，今必不能用矣。因彼已知所防也。閣下所言小船之法，亦甚是也。可知英雄所見略同，惟余輩有前失耳。」（按上筆錄引據彭澤周博士著「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臺北藝文印書館刊〕中之「關於中山先生的筆談殘稿」第二三九——二四一頁。）

國父與宮崎這一次晤面，是在廣州第一次起義失敗及倫敦蒙難以後，再旅日本，準備捲土重來再舉義旗的時候；兩人真是義氣相投，一見如故，初聚即深刻地研討再舉的地點及密送軍火方法。國父強調以廣東惠、潮、嘉三府爲首選。這就是本文所錄 國父致犬養毅書翰內涵意義最初緣起。

國父對於再舉義旗地點，認定惠、潮、嘉三府的地利人和，但實際見諸行動，仍在三年以後（史扶鄰博士撰「孫逸仙與中國革命緣起」[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y Harold Z. Schiffin] 第二二七頁謂：「孫選擇惠州爲第二次起義地點，可能是受鄭士良影響的結論。」這是沒有將國父與宮崎三年前筆談以及其他文件融會貫通而產生的錯誤推論）。因就上錄大船小船密送軍火一事觀之，國父了解中國俗語「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以及西諺「失敗是進步之母」的道理。廣州失敗以後，今次捲土重來，欲期成功，必須切實準備研究，不可重蹈覆轍。經費、領導人才、軍火來源及運送方法，尤其採用何種戰略戰術更關重要。自然等候宮崎寅藏等前往中國東南沿海實地觀察（宮崎於一八九八年五月才離日本赴廣州，十月中回東京）歸來後，客觀的結論及最近的實況與自己主觀的想法相互印證，也是一項因素。

日本外務省檔案「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革命黨關係）」中有神奈川知事報告（明治三十二年即西曆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七日）·鄭弼臣（士良）自香港來（橫濱）。又同年三月八日報告：橫濱居留地二一番之孫逸仙、陳璧（少白）等

近來頗繁忙模樣。聞同人等不日歸國。時機成熟，廣東立歸，舉反旗。同日前同居留地八一番地均昌號主人密製軍旗，如別紙弼形：白日居全旗四分之一之左上方中央，光芒八線，青色。頗似英國旗。全旗另四分之三地位是紅白相間橫線條（紅線四，其餘白色）。與廣州第一次起義陸皓東手繪「青天白日」及以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都不相同，自是日本警吏描繪時有欠正確。不論如何，惠州起義自此已開始前奏曲。一九〇〇年即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七日日本警視總監報告外務省：「孫文及楊飛鴻（衢雲）鄭弼臣三人今回香港出發，犬養毅、頭山滿、福本誠等作主，昨午後三時紅葉館送別宴。支那現狀談。九時散會。孫以土產名購過日刀劍數十口。」又同年六月十一日，神奈川知事報告：「孫逸仙臨行密談要領；①、在日本本身命無虞。……目下北京風雲甚急，若清國實力有失，我當把握良機。②、我最終目的；支那南部人民、支那帝國一部份之分割，建立一新共和國。現正畫策，集合多數同志，徐待時機。」比證中文資料刊載的「平治章程」內容多相合。可見國父此行決心大舉，比較廣州第一次起義計劃規模顯然壯闊多多。

是年（一九〇〇）六月十七日，國父乘船行至香港海域，稍停即按原計劃續